

●钟 瑛

论明清官修书目的时代特征

摘 要 明清官修书目的时代特征是:维护皇权的极端专利心态和对异己思想的禁止;讲究实际,强调务实;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学术大总结和大发展。参考文献 15。

关键词 中国古代 书目 官修书目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ly compiled bibliograph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follows: extreme autocracy and exclusion of dissidents, pragmatism, and summary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in the late feudal period. 15 refs.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Bibliography. Officially compiled bibliography.

CLASS NUMBER G257

明清时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漫长历程的终点。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进行一次彻底梳理与总结,成为历史赋予这一时期的重要使命。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不仅将古典书目的编制推向了书目史上的顶点,而且它以本身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肩负起了“总结前代、开启后来”^{〔1〕}的学术使命,既评述了古代学术,又体现出时代的价值追求。

不同于前代官修书目的严重散失,明清官修书目保存情况较好。明代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 12 种中有 9 种保存完好。清代官修书目 5 种,全部保存完好,即《古今图书集成 经籍典》、《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天禄琳琅书目》正续 2 部。这使人们对明清官修书目的研究建立在直接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之上。

1 极端专制的心态与手段

自始至终带着鲜明政治色彩的官修书目,发展至明清,渐渐失却了汉代官修书目的兼容并包、魏晋官修书目的多元吸纳、盛唐官修书目的雍容大度,从而走向了封建专制文化发展的极端。这一极端一方面表现在维护皇权的封建统治思想加重,另一方面表现在禁止异己思想的破坏手段加强。

明代初年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首先在所著录的 39 类图书中特立国朝类,专收明代皇帝的御制、敕诰、政书、实录等,并以此冠于全目之首,从而率先

将这种君主至上、制书宜尊的封建等级观念在书目分类上推向了历史的最高点。它很快在明清两代的书目分类中产生广泛影响,以后的综合性官修书目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国朝、御制、圣谕等立专类设置于全目之首,私撰书目也争相效仿,使之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特有风格。

如明代《国史经籍志》,集御制、中宫御制、敕修、纪注时政四目之书 257 种为制书类,置于全目之首。明《南雍志经籍考》分图书为 9 类,首列御制。明《内阁藏书目录》分图书为八卷 18 部。第一卷即是圣制部、典制部;《明太学经籍志》以柜为类,制书则立专柜收藏。明《行人司重刻书目》,分图书为六部,典部第一。并在卷首言明首列典部的理由:“有典有则,昭代鸿编,安上谐民,遵法罔愆,便宜时变,条奏翩翩,谏行言听,仰止先贤。叙典部第一,凡诸典故诸奏疏入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典范,表面看来,它并未在四部之外专立御制类,但实际上,此目在四部之首冠以乾隆皇上的《圣谕》25 道,《凡例》20 册,它们是统贯全书目的纲领,概括表达了乾隆皇帝的修书旨意及编目方法。而且,“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乃乾隆 46 年的谕文。

私撰书目中,如明代《晁氏宝文堂书目》,分图书为 33 类,以御制书居首,著录当朝皇室御制文章 23 种。明《棣竹堂书目》,分图书为 16 类,首列圣制类,

并在序中言明:“经史子集外,制特先之,曰尊朝廷。”明代《江东藏书目》说:“圣作物睹,一代彰矣,宣圣从周,遵一统故也,特为一录,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湊云,目曰制书。”明《玩易楼藏书目》:“首重王言,故一曰制。”清朱彝尊的《经义考》,分图书 30 门,仍以御注、敕撰居首。

在传统书目分类中,这种尊君重君的思想历来就有所反映,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没有如此夸张,一般只是在不影响原有类目设置的情况下,在应有的类目之中临时打乱时间顺序,将帝王著作前置于当代著作之首,如《汉志》中,在儒家类将《高祖传》13 篇移置于《陆贾》23 篇、《刘敬》3 篇的前面,将《孝文传》11 篇移置于《太常蓼侯孔臧》10 篇、《贾谊》58 篇的前面。《隋志》亦“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明清书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一不动大局的表达方式,而是大动干戈地打乱书目次序。

明清两代皆以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而著称。统治者极力执行思想箝制,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朱明王朝多次下诏:“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1]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程式化、教条化,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注释为标准,发明八股文,以死板的写文格式限制读书人的思想并规定“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3],禁止对当代问题的一切思考。清承明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推行绝对君主专制的同时,更加上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成份。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以各种名目对他们认为有越轨、悖逆迹象的人士进行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明代的锦衣卫就是专门的特务机构,以罗织文网为能事。清王朝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 108 起,其恐怖骇人听闻,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成书于这一专制极端时期的官修书目,在特别尊崇代表封建专制的御制之书外,又对其他带有异己观点的书籍极力进行摧毁与攻击。

历代官修书目的编制,虽都泛称御制,但实际上皇帝并不真正过问具体工作,而是委派大臣负责操作,最后仅过目编目成果而已。明清时期,这一传统编目习惯开始发生变化。明代官修书目因追求简明实用,大多没有叙文及提要,因此后人对具体编目情况不甚明了。但有些书目,前面冠有当朝皇帝的诏命、颁赐等,说明了皇帝对编目过程的关注。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总目》则表现得十分突出,《总目》前的圣谕记载了乾隆对编目过程的处处干预,从收书原

则到品评标准、窜改方法都有具体指示。《总目》《凡例》第一:“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袞钺斯昭。睿鉴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其言虽不免歌功颂德,但皇帝干预之勤亦可尽见。《总目》的编纂,始终体现着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这一文化盛举背后,伴随着一场清王朝亲自操纵的文化大清查。第一份征书之谕颁发的次年便开始了禁毁违碍书籍的禁书活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事隔一年,皇帝又迫不及待地下诏:“若仍前疑畏,不肯尽出所藏,将来或别露违碍之书,则是有意收存。”威逼治罪之意已直言不讳。《总目》编纂过程中,先后焚书 24 次。焚书总数,据陈乃乾《禁书总目》统计:全毁书目 2453 种;抽毁书目 402 种;销毁书版目 50 种;销毁石刻目 24 种。这仅仅只是一个大概数,民间恐致招祸,自焚其书者更不计其数。

2 崇实黜虚,经世致用

讲究实际,强调务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导学说儒学的基本精神。儒学体系博大精深,谈心性的内圣之学与讲事功的外王之学混然一体,然而其学说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发生了离异,苟况一系致力发展孔子的“外王”之学,孟轲一系着重发展孔子的“内圣”之学。内圣之学在宋代经统治者的提倡与学者们的努力下,形成了程朱理学与象山心学。程朱理学以僵化思想、扼杀人性为职能。象山心学则极力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把“心”作为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最终将理学推向了空疏虚妄。明清之际,人们反思历史,将南宋的灭亡与明朝的衰败归罪于理学末流的僵化与空谈性理。因此在理学一统天下的同时,一股反虚务实、注重实用的社会思潮兴盛起来。

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积极呼应这一时代思潮,明代官修书目以简明实用为追求,清代官修书目则以精审严谨为特色。

明初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首先开新了明代书目风气,一反唐宋官修书目追寻学术流变的宗旨,紧步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编制的后尘,注重书目登记与检索图书的实用功能,按贮书橱的顺序分号编排图书,将政府收藏的全部 50 厨书,划分为 20 号 39 类,

以方便检索的《千字文》前 20 字命名,“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厨,若干厨为一号而已”^[4],更无序文及提要,这一详于分类、疏于溯源的编目风气影响到整个明代书目的编纂。官修书目中,《内阁藏书目》、《秘阁书目》、《行人司书目》等主要书目皆是这种简明的帐簿性书目。分类上,不再遵循四部分类法的成规,而是根据具体图书的实际情况临时设置类目,仿《文渊阁书目》分图书为 39 类例,《内阁藏书目》分图书为 18 类,《秘阁书目》分图书为 35 类,《行人司书目》分图书为 6 类。在图书著录上,则但记书名、册数,不及其他。私撰书目纷纷响应,不仅明代,甚至有些清代私撰书目也深受影响。如明代私撰书目中,《晁氏宝文堂书目》分图书为 33 类,《江东藏书目》分图书为 13 类,《博雅堂藏书目》分图书为 17 类,整个明代私撰书目,除《百川书志》外,全无提要。清代私撰书目中,《也是园书目》分图书 8 类,《述古堂书目》分图书 78 部,《读书敏求记》分图书 46 类,朱彝尊的《竹垞行笈书目》更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诸字为类目。

清代官修书目的崇实黜虚,集中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上。《总目》从图书搜求开始,乾隆即下旨:“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有补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5]又《总目》凡例十二:“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以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将“有补实用”、“敦兹实学”作为重要的著录标准,反复强调。并以求实的精神对明清以来不断输入的西洋图书如实地加以揭示。《总目》凡例七:“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焉。”早在明代末年,徐光启主持西洋历局期间,就汇集“洞知历算之学”的耶苏会士,主持编纂了一部 17 世纪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崇祯历书》137 卷,将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一些重要科技文献与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汇为一体。清康熙年间,又聘用耶苏会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绘制出《皇舆全览图》。虽然康熙之后,中国对外的大门逐渐关闭,乾隆时期,中西文献交流活动基本停止,《总目》不仅如实地反映这批文献,并对其价值积极加以肯定。如《总目·西儒耳目资》下:“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究。”^[6]又《奇器图说》下:“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

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7]等等。

清代官修书目精审严谨的求实精神不仅体现在图书的著录与评价上,更体现在对不同版本的著录与真伪的考订上。

虽然“广搜异本”一直是我国传统书目编制的主要程序,但真正形成一股风气则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明代的官修书目,如《南雍志经籍考》和《内版经书纪略》;私撰书目,如《汲古阁校刻书》、《天一阁书目》、《古今书刻》,都注意到版本情况的著录。清代的《天禄琳琅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前者本身就是以记载善本书为直接目的的版本书目,它以官修的优势,著录宋辽金元明五朝的善本书 1000 多部。后者虽为综合性书目,但每书之下必著版本。见于《总目》著录的版本,大而言之有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 6 大类,细而言之则有 100 多种^[8]。《四库全书总目》还对一书版本源流及真伪情况进行考辨。清代康雍乾嘉四朝,是版本目录学大盛时期,著名学者几乎无不涉足于此,并涌现出一大批私撰版本书目,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季振宜的《季沧苇藏书目》,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丁丙的《藏本书室藏书志》。目录学成为一代显学,被誉之为学术中的学术。

3 大总结与全方位发展

明清官修书目“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主要书目类型皆以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再度争辉;对前代编目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大书目类型:注重学术流变的学术性书目和注重实用功能的帐簿性书目,它们全都在这一特定时期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学术性书目以分类、序文、提要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回溯与积累,使书目成为事实上的学术史。“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9]。《崇文总目》成书前后 7 年,《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用了整整 20 年。这种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穷尽目录学家毕生精力的高密度积累传统学术文化成果的书目,是我国古代书目编纂的主流,受到明清学者的充分肯定。

帐簿性书目的发展,肇始于政权更替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宋郑樵从理论上提出了“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泛释无义”的观点。有明一代,这

一流派的书目进入古典时代的全盛时期,是传统书目编制对自身作为揭示与检索图书工具的实用价值的真正觉醒,是特定社会环境下,书目形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明代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实践并推动了这一流派书目的发展,并很快得到同时代官私书目编纂者的积极响应,形成一股强大的编目潮流。帐簿性书目以其灵活的类目、简明的著录、便利的检索,得到了明代学者的青睐。“查检”、“稽览”、“检阅”等词汇成为明代书目中的通用词汇。

明清官修书目这种全方位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书目编制经验的总结与吸收之上。

在图书搜求上,明清目录学家总结前人经验,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购求图书的基本原则。祁承炘在《澹生堂藏书约》中提出图书购求原则是,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孙庆增《藏书纪要》提出的三项原则是:“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并对它们进一步阐明,极大地丰富了前人搜求图书的理论。

《总目》的图书搜求,不仅在方法上集前人之大成,并制订出一些具体可行的购求措施。如乾隆 37 年正月初四谕:“在坊市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镂刊,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善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汇辑之书,卷帙必多,若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摺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覆,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进取。”明代是书目史上图书分类方法最为丰富的时期,有沿用传统四部的分类法,有对四部稍加改造的分类法,有完全抛开四部另创新规的分类法。

清代官修书目则力倡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的成功实践与大量分类理论的阐述,使四分法再一次稳固了它的优势地位。乾隆 38 年曾下谕:“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这为《总目》的分类定下了基本原则。《总目》分图书四部 44 类 66 属。与 1000 多年前的《隋志》四部 40 类相比,仅多出四类,三级分类也是上承唐宋。每一类目的分并改隶,都“务求典据”、“择善而从”,并对各家分类错误,逐一加以考核。依乾隆旨意,“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10]。此外还有一些具体分类细则散见于“凡例”、“小序”、“按语”之中。

书目分类作为书目编制的重要环节,明清目录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焦竑《国史经籍志》后附有《纠谬》一卷,纠前代编目之谬者 200 余处,并继承发扬郑樵的分类思想,提出“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立则书亡,向歆剖判百家,条纲粗立,自是以往,书名徒具,而流别莫分,官滕私楮,丧脱几近。”又说:“记有之,进退有度,出入有局。书之有类例,亦犹是也。”祁承炘在其《庚申整书略例》中,更提出了“通”与“互”的理论:“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这即是清代章学诚所说的互著别裁。章学诚还对我国图书分类的起源、意义、目的等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图书分类的起源是“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11],图书分类的意义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2]图书分类的目的是“欲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书当求其名实,不以人名分部次”、“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徇于其名而不考其实矣”^[13]。这在前代分类理论之上更进了一步。

在图书著录上,明代官修书目发扬检索性书目的优良传统,但记书名、册数,简明实用。清代官修书目则考辨溯源。《四库全书总目》序文提要俱全。序文论各部源流演变,各类分并改隶,如果义有未尽、例有未该的,又于子目之末或本条之下附注按语。“所列诸书,各为提要。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14]章学诚对著录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认为“著录之道,不系存亡而系于考证”,主张书目应有叙录,并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15]在具体著录细则上,对一书数名,一人多号、书有同名而异实,书有讹误更定其文,两说可通,删去篇次,著录残逸不全等具体情况,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互著”“别裁”法,更完善了图书著录的方法。明清书目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发展,为自宋代开始的经验目录学画上了句号,将书目发展推向了理论目录学阶段。

参考文献

- 1 来新夏. 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 历史研究, 1981(2)
- 2 陈鼎. 东林列传. 卷 2. 见: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 3 顾炎武. 日知录·试文格式.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
- 4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文渊阁书目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5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 见: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周庆山

香港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摘 要 香港图书馆主要包括公共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管属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及专业图书馆三大系统的图书馆。近二、三十年,香港的图书馆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专业教育和科研基础薄弱等缺陷。要进一步发展香港图书馆事业,应当在完善发展计划、发展专业教育和研究,以及加强内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采取措施,多多努力。参考文献 9。

关键词 香港图书馆事业 发展成就 问题分析 发展战略 交流合作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Libraries in Hong Kong include public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special libraries.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librarianship in Hong Kong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re is also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for which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measures. 9 refs.

KEY WORDS Librarianship in Hong Kong. Achievements. Analysis. Strateg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LASS NUMBER G250

本文对香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战略进行探讨,旨在分析香港图书馆在回归祖国后的发展状况,针对图书馆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经验,提出建设 21 世纪香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1 香港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香港图书馆事业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其间的发展经历了迂回曲折。直到 1962 年香港政府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公共图书馆大会堂图书馆,并于 70 年代进入了建设和发展阶段。这与 70 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有密切关系。1995 年 9 月开始动工兴建的大会堂图书馆新馆大楼已经落成,标志着香港图书

馆事业正在迈向新的世纪并且开始取得突破性发展。除了公共图书馆之外,香港还有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这三种类型图书馆独立存在,又彼此互补依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1.1 公共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图书馆系统

目前香港的公共图书馆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平行的,互不隶属。市政局的管辖范围包括香港岛及九龙地区,区域市政局管辖新界地区。

市政局设有图书馆委员会来指导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原则是为每 20 万人设一所区级图书馆,市内每区最少有一所;在人口稠

- 6 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小学类存目
- 7 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谱录类
- 8 曹之. 古籍版本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 9 唐·毋煚. 古今书录序. 见:旧唐书,卷 46,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四库全书总目 卷首
- 11 章学诚. 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见:王重民. 校雠通义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章学诚. 校雠通义自叙

- 13 章学诚. 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 14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 15 章学诚. 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注 本文为湖北省九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三千年图书馆学文献整理”成果之一。

钟瑛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通讯地址:湖北武汉。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2000-11-21)